

# 翻譯理論彙編

哈爾濱外國語學院  
翻譯教研組  
1956.7.

2)5  
32

## 目 錄

|                                       |                 |
|---------------------------------------|-----------------|
| 序 言.....                              | ( 1 )           |
| 1.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翻譯..... A. B. 費道羅夫( 7 ) |                 |
| 2. 中国作家和俄国作家論翻譯.....                  | (26)            |
| 3. 翻譯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 A. B. 費道羅夫(31)    |                 |
| 4. 論用形象來翻譯形象..... Л. H. 索伯列夫(42)      |                 |
| 5. 必須把文学翻譯工作提高到艺术創造<br>的水平 .....      | 茅 盾(59)         |
| 6. 朱柯夫斯基論翻譯 .....                     | 茹 普(63)         |
| 7. 譯天演論例言 .....                       | 嚴 復(71)         |
| 8. 關於翻譯的通信..... 瞿秋白、魯 迅(75)           |                 |
| 9. 可譯性問題的說明及确切翻譯<br>的原則 .....         | A. B. 費道羅夫(88)  |
| 10. 翻譯的准确性..... Л. H. 索伯列夫(99)        |                 |
| 11. 論从外国語譯成本國語時合乎規律的相適應<br>的手段 .....  | Я. И. 列茲凱爾(104) |
| 附錄：中国翻譯史簡述 .....                      | ..(119)         |

## 序 言

這本書是供學習翻譯課作參考用的。這裡收集了有關翻譯理論的文章十一篇，附錄翻譯史一篇。編選這些文章的目的是使同學了解我國及蘇聯翻譯史上有關翻譯理論的主要論點，以便通過學習，掌握翻譯的基本理論，為今後實踐服務。現將各篇文章主要內容簡介如下。

為了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認識翻譯理論問題，我們第一篇文章就選了費道羅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翻譯”一文。我們知道，翻譯；簡單的說，就是把已用一種語言表達的思想內容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因此脫離了語言就無所謂翻譯。對語言本質的正確了解將有助於解決翻譯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無論思想也好，語言也好，本身都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王國，它們只是實際生活的反映。”“語言與意識相同，產生於和他人交際的需要，產生於和他人交際的迫切需要。”列寧給語言下的定義是：“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既然，語言是現實的反映，那麼已用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容，就能為用另一種語言的人所了解和表達出來，因為現實是客觀存在，是可以認識的。這樣可譯性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肯定。此外，既然，“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那麼翻譯如果不起交際工具的作用就不能稱為翻譯；衡量某篇譯文時，這也應當是標尺之一，因此翻譯準確性問題也應以此為基礎。關於這些問題，該文作者都作了簡要闡述。

另外，該文還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翻譯的深刻見解。他們要求譯者要完全理解原文，正確表達意思，尤其要理解原

文所表达的現實。這些要求和他們對語言的理解是一致的。他們也非常重視譯文的語言與風格問題。他們反對逐詞死譯，提倡創造性地對待翻譯。

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翻譯”將有助於我們在更深廣的理論基礎上來認識翻譯的本質。

第二篇是中國作家和俄國作家的語錄，這裡收集了他們有關翻譯的性質、作用、準確性以及對譯文語言的要求和可譯性等問題的見解。這些作家都是語言大師，他們對語言藝術的深刻理解也必然反映到對翻譯的見解中來，因此研究這些見解對翻譯理論和實踐都會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A. B. 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是他的“翻譯理論概要”一書的縮影。作者根據馬列主義的語言學說，對翻譯中的一些主要問題作出了系統的總的論述。例如，作者在對比兩國語言的不同特點的基礎上，說明了翻譯的實質乃是根據原文整體，在譯文語言中尋找和選擇在意義和感情的作用上相當於原文的各種表達手段的過程，因而他認為翻譯在任何場合都是語言方面的一種創造性活動，逐詞死譯或形式主義的翻譯都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這篇文章是我們研究翻譯理論、研究“翻譯理論概要”一書的提綱和入門。

A. H. 索伯列夫“論用形象來翻譯形象”是有關翻譯的比較新的文章，這裡只節譯了該文的前一半。作者通過翻譯和語言的關係、翻譯和語言學、文藝學的關係，進一步揭示了翻譯的本質，肯定了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並着重論述了文藝翻譯的特點。

作者在談到語言和翻譯的關係時指出，語言是全民族的，它按其內在規律發展，因此不同語言的詞彙、語法、修辭方面很少相同。要翻譯詞和語法是不可能的，但隱藏在語言中的思想、形象是可譯的。思想內容和形式是聯繫著的，因此翻譯的目的是把原文的形式、內容從一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言。這就要求創造性選擇

表达手段，这种选择不仅与语言学有关，也与文艺学有关，因为在从几个译法中选择一个时，不仅要靠狭义的上下文，而且也要靠整篇作品，它的基本思想、风格和原作者的创作特点，而这就是文艺学问题。作者在这里批判了列福尔马茨基和费道罗夫的不全面的看法，进一步说明了翻译理论问题。

作者认为文艺翻译的特点是用形象翻译形象，并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的两个法译本来具体说明。这一点对理解文艺翻译的本质是很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摆脱形式主义的死译。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逐词死译和形式主义的差别，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着重批判了形式主义。

矛盾的“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是他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如何提高翻译质量，特别是文学翻译质量的问题。报告人指出，译者对翻译的认识、态度和修养是决定译作质量高低的因素。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它要求译者有全部的创造性。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对于一般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最低要求，指出了从事普通翻译和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最后报告人还论述了翻译中语言的运用问题，他认为必须辩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反对机械地硬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完全破坏原文语法结构和词彙用法的绝对自由式的翻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文达到确切的标准，再现原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朱柯夫斯基论翻译”一文概括地介绍了他的翻译理论。他通过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艺术，驳斥了认为翻译是技术性工作的看法。他指出，一篇艺术翻译的价值是不能以偶然的错误来衡量的。如果译文没有背离原文的整个脉络，并能把原作主要的东西，即把原作者艺术上的个性表达出来，则其全部翻译仍有崇高的价值。为了要达到这一点，译者最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知识范围来选择翻译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融合原作者的意图，才能科学的

了解原文，並正確地复制原文一切涵义与風格的特点。

嚴復在“譯天演論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是翻譯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当时是比較完備的，也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他認為“信”与“达”是統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兩個因素，这个見解是十分正确的。然而他对“达”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他說：“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为达易，用近世俚俗文字，則为达难”。同时他对“雅”字的解釋也沒有从語言要適應社会發展而發展这个角度出发，于是便拿一个“雅”字打消了“信”与“达”。不过他所首創的“信达雅”已成为我國数十年來討論翻譯标准的一个中心問題，有助于我們从歷史上來研究我國翻譯理論家对翻譯标准的各种看法，因此我們把这篇文章也选入本書。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嚴復的主張，我們把这篇文章譯成現代漢語，附錄在原文的后面。

瞿秋白和魯迅的三篇“論翻譯的通信”着重論述了下列兩個主要問題：

① 瞿秋白和魯迅，从翻譯的目的和作用出發，探討了翻譯的标准。他們指出嚴復对信达雅的解釋是錯誤的，並着重批判了趙景深“宁順而不信”的論調。瞿秋白認為翻譯的标准應該是“絕對的正确，絕對的白話”，他並且指出這兩者是不能分割的、統一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容忍多少的不順”或“宁信而不順”的論調都沒有抓住翻譯标准的根本問題，犯了提問題的方法論上的錯誤。

瞿秋白与魯迅研究翻譯标准的方法和对翻譯标准的見解是我們正确認識翻譯标准的根据，对今天解决翻譯标准問題的爭論來說也有極大的指導意义。

② 瞿秋白与魯迅全面論述了吸收新表現法的目的、方法与應該注意的地方。輸入新表現法是翻譯的作用之一，是譯者为了完全达到翻譯标准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新表現法必須符合中國語文的語法規律，使“異样的句法”能“据为己有”，因此要注意正确的

吸收，防止濫造。瞿秋白和魯迅認為吸收新表現法是使一個民族語言發展的積極手段，他們的這種見解是符合於馬列主義語言學說的基本論點的。

A. B. 費道羅夫在“可譯性問題的說明及確切翻譯的原則”一文中論述了翻譯理論中最有原則性的兩個問題：可譯性問題與確切翻譯問題。

作者從馬列主義語言學說、原作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以及部分和整體的關係等角度出發，肯定地解答了可譯性問題，但同時也指出了可譯性原則受限制的某些場合。

在論述翻譯的確切性時，費道羅夫首先批判了翻譯中的形式主義及其各種表現。他認為要達到確切翻譯，有時就必須多多少少脫離形式上的準確，甚至必須“犧牲”某些東西。因此他認為，確切翻譯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並不要求在字面上完全接近原文，而是要求運用那些雖然形式上和原文不相符合，但卻符合譯文語言規範，並在整體中能起同樣表現作用的語言材料。這裡，部分和整體之間一定的均衡乃是達到確切翻譯的必要前提。

這篇文章是我們今天研究翻譯標準、解決翻譯爭論的科學根據，它對我們的翻譯實踐也有極為深刻的指導意義。

Л. Н. 索伯列夫在“翻譯的準確性”一文中指出，必須把逐字翻譯的準確與確切翻譯區分開來。確切翻譯應該象畫家繪畫那樣，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接近原作活生生的內容、正確傳達原作的重要特徵。任何一個確切翻譯的前提都是完全而正確的理解原文。這裡，文藝作品翻譯的特點就在於原作的思想必須通過形象而複製出來，也就是說，要用藝術的手段，形象的方法來表達原作。而一般社會政論作品的翻譯和自然科學、應用文、新聞報導作品的翻譯又各有自己不同的特徵。此外，這篇文章還強調指出，翻譯的準確性問題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教學上也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外語教師與外語師範學院的學生都必須明確了解翻譯準確性的定義。

Я. И. 列茨凱爾所著的“論從外語譯成本國語時合乎規律的相應手段”是翻譯準確性問題的發展與具體化。作者指出翻譯時相應的手段有三種：絕對等值手段，相對等值手段，確切代替手段；應用那種手段是與原文的性質有關係的。這些論點有很大的實踐意義。在翻譯科技文章時我們將重視術語的絕對等值手段，而在翻譯文藝作品時則常常應用確切代替手段。

作者從詞彙、習用語、句法、韻律等各方面論述了各種相應手段。作者用具體例子說明了什麼時候需要用絕對等值手段，什麼時候用相對等值手段或確切代替手段以及什麼時候不可以。他的中心思想也是反對形式主義的翻譯和任意歪曲原文的翻譯。他反對把文章的各個組成因素（內容、思想傾向、情感和風格等）隔裂開來，認為只有注意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才能達到確切翻譯。

最後作者還通過具體例子論述了達到確切翻譯的四種方法：

1) 使未分化的、抽象的概念具體化，2) 根據邏輯將概念加以引伸，3) 反說翻譯，4) 補償辦法。這些方法主要是在尋找確切代替手段時應用的。在尋找確切代替手段時，這些方法能啓發你怎樣擺脫原文字面的束縛和打開你的思路。這些方法也是有實踐意義的，能使我們找到看來似乎是不正確的，但卻是合乎規律的一些翻譯方法。

最後，為了帮助大家研究我國從東漢以來的翻譯歷史和古代各種翻譯理論與翻譯方法的演變，了解我國翻譯家的修養和從事翻譯工作的態度，以便總結與吸取前輩的歷史經驗，我們特將“我國翻譯史簡述”附錄在本書的最後。

編者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

##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翻譯

費道羅夫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翻譯方面所作的指示，大部分是在蘇維埃時代纔為廣大讀者知道，這些指示都是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這一時期寫的；而列寧的指示則是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年及本世紀最初的二十多年寫的。所有這些指示，由於全部內容都很深刻，由於具體而又實際，所以，也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全部遺產一樣，在目前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翻譯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有許多詩人和學者，曾經以各種形式發表他們的意見，說完全確切的翻譯是可能的，可是他們都不能證明和論證這種意見。要使翻譯的可能性這一原則能獲得真正科學的論證，就必須對語言有新的理解。這種理解必須和受着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語言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觀點所約束的理解完全不同。只有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對語言概念所下的定義才能使我們對語言有新的理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中指出了語言的特點，就是：語言“對他人是存在着的同時對我自己也是存在着的實際的意識”。<sup>①</sup>他們並指出：“語言與意識相同，產生於與他人交際的需要，產生於與他人交際的迫切需要。”<sup>②</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的另一處指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

---

① 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十頁。

② 同上書，同卷第二十至二十一頁。

夾。”❶“無論思想也好，語言也好，本身都不能組成一個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實際生活的反映。”❷

語言的這個特征表示語言是因交際的需要而產生的，是與實際生活相聯系的。正因為語言與現實相聯系，語言（和思想一樣）是現實的反映，所以語言表達的內容，是大家所能共同理解的（因為這個內容跟另一些人的思想和語言中所表現的現實是相聯系的）。

用新的，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理解語言，就為研究各種語言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因而也為研究翻譯的可能性問題開辟了新的前途。

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其他意見也保存了下來，這些意見具體地反映了他們對翻譯的看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翻譯的意見很多，散見在他們的著作、論文和通信中，其中大部分是針對某些譯作所提出的個別的但總是原則性的意見。

所有這些意見都具有實用性，而且都有明確的、代表一定體系的理論根據。雖然這些意見只涉及社會政治作品，但這絲毫也沒有限制它們的意義，一點也沒有縮小它們適用的範圍。因為這些意見首先涉及的是關於在翻譯工作中如何使用語言的基本問題。在社會政治作品中，特別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運用語言的技巧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擺在翻譯工作者面前的任務也是特別複雜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卓越的語言學修養，他們都懂得許多種語言。“馬克思能閱讀用歐洲各國語言所寫成的著作，能用德、法、英三種文字寫作，並且寫得使通曉這些語言的人都稱讚不絕……馬克思到五十歲時才開始學習俄文，儘管俄文很難學，但僅僅經過六個月之後，他就能津津有味地閱讀俄國詩人和散文家的作

---

❶ 同上書，同卷，第四三四頁。

❷ 同上書，同卷，第四三五頁。

品，其中他特別推崇普希金、果戈理和謝德林三人的作品。”<sup>①</sup>

恩格斯除了他的祖國語言德文而外，除了法文和英文以外，還能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意大利文寫作。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古代拉丁文和希臘文都有深邃的造詣。他們不僅有語言的實際知識，而且有語言方面的理論知識。他們兩人的語文科學知識都遠在當時的一般水平之上，無怪乎恩格斯能寫出獨創的語文科學研究的著作“弗蘭克方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活動中都會不止一次地實際接觸到翻譯，他們的著作譯成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而有些著作開始是用法語（如馬克思的“哲學底貧困”）或英語（如恩格斯給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所寫的序言）寫的，然後譯成德文，而且譯文都是經過他們兩人看過同意後才發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校對自己著作的譯文，例如馬克思曾校對“資本論”的法譯本，恩格斯曾校對“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這些譯本在表達內容方面既非常確切，而在譯文語言的修辭方面又極其豐富。讀起這些譯本來就象讀原文一樣，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自如地掌握了其他語言，就能夠找到確切的表達方法來表達原文。

馬克思在“資本論”以及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底現狀”里的許多引文，都是他們自己從英國史料中譯過來的。恩格斯翻譯了沙爾利·傅立叶的作品。<sup>②</sup>他在學習俄文時，對普希金的“叶甫格尼·奧尼金”一書作了詞彙筆記，並且用散文翻譯了該書的第一章。除此以外，他還給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詩文的翻譯作品，如“蒸汽王”（король пар），“契近老爺”（Барин Тидма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翻譯和校對，這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大題目；根據研究的

① 參閱拉法格「回憶馬克思」一書中文版第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② 參閱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一卷，第四章，四一一至四五〇頁。

結果，根據他們兩人的經驗，就能做出最有價值的總結，但在本章之內我們只研究他們對翻譯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處理翻譯中的各種問題，是具體的，實際的。他們對翻譯工作者經常提到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完全理解原文的意思，和確切地表達原文的意思，尤其是要正確地表達出用另一種語言敘述的事物和概念，也就是要認識原文中所反映的現實。恩格斯在對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一書所寫的書評的結尾曾建議把該書譯成德語（雖然他並不同意作者的看法）；而談到應怎樣翻譯該書時，恩格斯又說：“但是翻譯匠可別着手翻譯這本書！卡萊爾是用特殊風格的英語寫成的，如果翻譯者沒有徹底了解英語，不懂得他對英國人生活所作的各種暗示，就會造成極可笑的錯誤。”①

一八七七年馬克思校對了里薩格里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德譯本，譯者是出版局約定的伊卓爾婕·庫爾茲，她譯得非常糟糕。

下面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關於譯文中由於不知事實和不了解原文意思而犯的錯誤的一些意見：

“在十七頁上，我們的這位美人把 *mandat tacite* 譯為‘啞委任狀’，這是毫無意義的，德文可以講‘默然’同意，但如論如何不能說‘啞’。在同一句內，*marche de Ferrières* 原意是說柔里·法夫拉到俾斯麥所在地費里爾去旅行，卻被她譯成‘費里爾的步伐’，這樣就使費里爾這個地名變成人名了。

.....

“在二〇頁上，她把 *l' Hôtel de Ville* 譯成‘市自治局’，而作者所指的卻是在 *l' Hôtel de Ville* 開會的九月政府。”

“在三二頁上庫爾茲把 *Jules Favres demandait à Trochu sa démission* 譯成柔里·法夫拉要求特羅秀准許他免職。而一個人是

---

①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三四七頁。

不能自己免除自己的职务的，只能被上级免职。因此这一句譯文的意思只能是柔里·法夫拉想獲得特罗秀的允許，准他擺脫目前他所从事的职务。可是实际上則是柔里·法夫拉要求他（特罗秀）辞职，而‘démision’这个字按字面譯也就是辞职。”①

馬克思也極力反对机械地逐字死譯原文的詞組，反对只用首先想到的譯法，因为这样的翻譯会使文章模糊不清，会破坏德語的規範。例如：

“‘Rationnement’这个字应譯为嚴格规定的口粮（例如在被包围的要寨中，在儲藏將尽的船里），而她却譯为‘供給所有公民’（Verpflegung aller Bürger）（第十六頁）；換言之，她总是把首先想到的字用在譯文里，不問其意义是否切确。”②

“她把‘……Trochu……lui fit une belle conférence’（特罗秀好好地教訓了他一頓）譯成‘在他面前主持了一个很好的會議’，这完全是学生式的逐字死譯，在德文中是毫無意义的。”③

“在五十一頁上，庫茲把‘des intrigants bourgeois qui couraient après la députation’（追求議席的資產階級陰謀家們）譯为‘追着代表团跑的……’，即使是小学生恐怕也不会比这譯得更糟了。”

.....

“在五十四頁上，她把‘une permanence’譯成‘常务的會議’（这是什么怪东西呀？），其实應該譯为‘常务委員會’。”

.....

“在七十五頁上，她把‘C’est que la première note est juste’譯成‘由于第一次的估計（！）是正确的’，其实該譯为‘由于他們一开始就采取了正确的态度’。”④

① 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二六卷第四六一至四六二頁（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波勒格的信）。

② 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二六卷第四五九頁。

③ 同上書，同卷，第四六一至四六二頁。

④ 同上書，同卷，第四六七頁。

馬克思的這些意見是很有指導意義的，不僅在要求翻譯者按照上下文理解了意義然後翻譯，而且所指出的那些錯誤，也正是沒有經驗的或者是初出茅廬不善於利用詞典和辨別詞義的翻譯者所常犯的。在這方面特別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note”這個詞的譯法。因為這個詞的意思很多（尤其是在音樂方面，它既有音調的意思，也有節拍的意思），所以在翻譯時必須從很多可能的譯法中選擇出一個最正確的來，而這種選擇只有根據上下文才有可能。

馬克思對里薩格里這本書的翻譯並沒有提出什麼複雜的、專門的修辭方面的要求，但是伊卓爾德·庫爾茲的翻譯連馬克思所提出的非常簡單並且十分自然的要求，即正常地、確切地運用語言這一點，也未能滿足。馬克思在對這一譯作下評語時寫道：“總的說來，這個譯文不僅不正確，而且其用語的無力、庸俗與混亂，簡直使人吃驚。雖然如此，但這個譯文在某些方面是可能合乎德國人的口味的。”①

馬克思在校閱此書的不久以前，也就是剛提出要用德文出版里薩格里這本書的時候，於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給伯拉克寫了一封信，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是主張不要社會民主黨的記者可夫斯基翻譯這本書的，因為“他完全沒有翻譯這本書所必須具有的運用輕快、靈活的語言的風格”。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寫作或在校對和評論別人的原著或譯作時，都非常重視語言與風格的問題。他們兩人在風格方面，正如他們在其他一切活動上一樣，都是革新者。他們創造新的科學術語，不斷地使詞彙豐富，同時力求使書面用語的句法接近於生動活潑的口語規範。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修辭原則是適於表達天才的、深刻而新穎的革命內容的，要實現他們的修辭原則，非有創造的勇氣不可。關於這一點，很可以用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五日給伯恩斯

①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二六卷，第四六六頁。

② 同上書，同卷，第四三三頁。

坦的信來說明。在這封信中恩格斯論及伯恩施坦翻譯的馬克思的一部外文原著的德譯本時寫道：

“在第一頁上，你力求忠實而準確地表達原意，但是你有些忽視了風格，就只是這一點。而我很想在譯文中表達出馬克思所特有的、但你是很不習慣的那種風格，這就是我為什麼在譯文中許多地方做了修改的緣故。

如果你把內容譯成德文之後，再讀一遍初稿，注意修辭的流暢，並且想到隨處盡量避免那種強使我們記住的、亦即硬要把從屬句中的動詞放在句尾小學生式的拙笨句法，那末你就不會遇到重大困難，就能把一切都譯得很好了。”<sup>㉑</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及他們的德文原著的外文譯本時，對於表現了語言的輕快性和靈活性的譯本，總是給以很高的評價的；而對於缺乏輕快性和靈活性的譯本，他們總是深感不滿的。例如馬克思對「資本論」的俄譯本給了特別的估價，他給達尼愛爾孫（Даниэльсон）的信中寫道：“譯得妙極了。”（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sup>㉒</sup>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是怎樣地重視這一著作的修辭，以及他對指出了他的高度語言技巧的「星期六評論」（英文版）及「聖彼得堡時報」（俄文版）的評論感到多么滿意。<sup>㉓</sup>

另一方面，也有這樣一種譯本，即在譯文中沖淡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十分珍視的修辭特點。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對這種譯本所作的批評吧。他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

“昨天我讀到了關於工廠立法這一章的法文翻譯，雖然我尊重譯者

㉑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二七卷，第三五〇頁。

㉒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二六卷，第二六〇頁。

㉓ 參閱「資本論再版后記」，後來在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在用俄文出版了「資本論」的各種譯本後，列寧在給「卡爾·馬克思」一文所寫的「馬克思主義書報評述」中（首先載在葛勒諾特兄弟合營社所出「百科全書」第二八卷）指出：達尼愛爾孫的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卷二與卷三）是比較不好的，倒是經柏札羅夫和斯切津諾夫校對過的譯本比較好一些（參閱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六六至六十七頁）。

的翻譯技巧把該章譯為雅緻的法文，但我仍然為這樣美好的一章感到惋惜。這一章的力量、風味和生氣都消失了，作家精確地表達自己思想的可能都因語言遭受到閹割而喪失了。用這種受常規束縛的近代法語來表達思想愈來愈沒有可能。為迂腐的形式邏輯的規律所限制的組織句子的方法，會使敘述喪失掉一切鮮明性與生動性。”❶

恩格斯對翻譯的一系列看法以及對翻譯者底要求，在“不應當這樣翻譯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第一章，第二三〇至二三八頁）這篇論文中敘述得最完善。這篇論文是對“資本論”不成功的第一個英譯本的批評。這篇論文中的原理和定義具有非常廣泛的普遍的原則性，翻譯任何思想特別深刻，語言特別豐富，用語特別大膽而作者的個性表現得十分顯著的任何一部巨著都可以應用。

馬克思的風格是深刻內容的表現形式，恩格斯在指出馬克思風格的這種特點時，規定了翻譯的任務如下：

“要用同樣的風格來表達馬克思的著作，就不僅要澈底掌握德文，並且要澈底掌握英文。”❷ “有力的德文要用有力的英文來表達。要運用語言中的最好的材料。新創造的德文術語要求創造與之相應的新的英文術語。”❸

根據這個任務，恩格斯對布洛德豪士的翻譯作了總的評價，對他不成功的地方作了解釋：“但是布洛德豪士每當遇到這樣一些困難時，不僅語言的材料不夠，而且勇氣也不夠。只要稍微超出他的有限的詞彙，只要有一点点超出英文常用語範圍的新東西，就會把他嚇住，於是他就不敢去冒險，只把困難的德國詞譯為相當不確定的術語，在他自己聽來並不刺耳，但是作者的思想卻給弄得模糊不

❶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四卷，第四二三頁。

❷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章第二三一頁。

❸ 同上。

清了。更坏的是：如果同一个德國詞出現了好幾次，他就把它譯成各种不同的術語，他忘掉了專門術語是應該譯得始終如一的。”<sup>①</sup>

“例如 ‘labour-time’（工时）这样一个簡單的新詞，他已不能勝任了。他把这个詞譯成：（一）‘time labour’，这个詞如果能表示什么的話，那就是指按期付与工資的劳动，或在强迫劳动時間內所从事的劳动；（二）‘time of labour’ 劳动的时间；（三）‘labour-time’（工时）；（四）‘period of labour’（劳动期限）……”<sup>②</sup>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翻譯者在翻譯新的術語或新詞時，必須要有創造的勇氣。

這篇論文的后一部分詳細地具體地分析了布洛德豪士的各式各樣的錯誤，其中包括術語混亂不清，不善于表達原文的意思，錯誤地理解原文以及語文質量很差等。

從上面所有的引文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容忍一切歪曲原文和抹煞原文政治意義之類的錯誤，不容忍翻譯匠式的翻譯。他們對翻譯所抱的正面要求也是十分明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最徹底地理解原文，就是說要徹底理解原文的政治傾向，熟知原文中的一切事物和概念及其在兩國語言中的名稱，要求深入領會語言的微妙之處，他們認為不但必須用確切的語言表達原文的內容，而且必須保持作者風格上的特點。

從上面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來對列寧）來說，不可能翻譯，不可能找到適當的表達法這種問題實際上是根本不存在的。這一點與下面五種因素有關：（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掌握了原著的語言和翻譯所用的語言，掌握了翻譯所用的各種修辭方法；（二）因為他們具有非常廣闊的科學眼界和無限豐富的各种知識，所以他們在任何場合下都熟知原作中的事物和概念，他們要求翻譯工作者也要具備同樣的知識；（三）他們把整篇

① 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四卷，第四二三頁。

② 同上。